

# 法兰克福学派 与西方马克思主义

■陈英俊<sup>1</sup>

(200083 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

中图分类号:D4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9470(2011)03-49-03

**摘要:**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系,它对1960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复兴,有着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法兰克福学派的主要理论家的思想曾引起广泛的兴趣,这确实有其值得注意的特殊意义。因为,在以“哲学”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风气盛行的鼎盛时期,他们的著作显然激起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共鸣。

**关键词:**法兰克福学派 西方马克思主义 批判社会理论

德国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理论,在过去三、四十年间,曾对社会学造成不容忽视的影响。原先,在德国威玛共和时期初年,德国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心。其主要人物及其著作也因而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之间存在着某种微妙的关系。从上个世纪30年代霍克海默(Max Horkeimer)的前期作品到近年来哈贝马斯的著作,都有迹可循。然而,霍克海默与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所发展起来的独树一帜的“批判社会理论”,以及后期的法兰克福学派理论家们所做的进一步发展,已经形成了一股思想和

观念的思潮(即便有时有些贫乏、空洞),这使法兰克福学派在现代社会学的兴盛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尽管许多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有点貌合神离地拒绝接受某些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但是它对一九六〇年代后期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的复兴,却有不可忽视的促进作用。

韦伯社会学中强烈的文化悲观主义,特别是在韦伯对现代社会的合理化过程的想法上,与霍克海默、阿多诺和马尔库塞对资产阶级文化和学术思想的彻底批判(此批判是从30年代至60年代批判理论的主要部分)之间的令人注目的平行关系,也是相当耐人寻味的。诚如博托莫尔对这一平行关系所做的清楚说明,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家乃是由于他们的悲观主义,而脱离了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进而走向一个本质上具有哲学意味的新黑格尔主义的意识形态批判。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阿多诺,也许最好把他们看作是“失望的激进分子”。他们致力于建立一个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而这一理论又特别强调文化的表现优先于其他的层面。由于德国法西斯主义兴起的经历,关系着他们对文化迷失和没落的风气的感受,因而这些人在这一时期所发展的“批判

1 陈英俊,男,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社会学系副教授,社会学硕士,研究方向为:社会学、社会工作、心理咨询等。

理论”格外关注社会价值和文化价值日渐增加的非理性成分,以及对实证论和科学主义的思想之反省。马尔库塞的“批判理论”中就有不少成分,具有从哲学沉思而不是从经验观察来从事“意识形态批判”的特质。尽管事实上,1950年法兰克福学派结束流离岁月之后,马尔库塞选择永久定居美国,并且因此受到美国社会思想中势力强大的经验主义传统的影响。他的《单向度的人》(One-Dimensional Man)一书(他的代表作)依然坚定地保持着法兰克福学派著作深思的特性,对先进的资本主义采取哲学的批判,这一特质或许可以说明为何它所造成的极大的声望,并没有导致对它所包涵的主题进行经验性的探讨之明显意图。

法兰克福学派主要理论家的思想曾引起广泛的兴趣,这确实有其值得注意的特殊意义。因为在以“哲学”来解释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风气盛行的鼎盛时期,他们的著作显然激起了人们的共鸣。1968年后的英语世界之所以对法兰克福学派“升起”兴趣,并非意外之事。

但是,如果说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自1960年代以来逐渐演变为一个愈来愈疏远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理论,这部分是因为向结构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自己的历史理论的回归,已经和批判理论极端的哲学要旨产生了冲突。随着这一演变过程,年轻一辈的批判理论家诸如哈贝马斯,已有明显而逐渐增强的趋势,试图为他们的著作在哲学与社会学之间确立自己的位置。至于这一意图是否能够成功,则尚有疑问,特别因为它并未从更大的视野,从历史过程和经验的检验来展现批判理论。

## 二

法兰克福学派是一个复杂的现象,并且与它相连的社会思想的范式——批判理论——也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得到阐述和解释。制度上,这个学派得以发展的基础就是社会研究所,这个研究所是基于德国教育部的一项决定,与法兰克福大学联合,于1922年2月3日正式成立的一个机构。但是,社会研究所本身只是1920年代初期,一个富裕谷物商的儿子菲力士·魏尔(Felix Weil)所筹划的若干激进研究计划重要的延伸的结果。在1922年夏季他曾组织了“第一届马克思主义

工作周”。当时的与会者有卢卡奇(G·Lukács)、科西(K·Korsch)、波洛克(Friedrich Pollock)和魏特复格(K·Wittfogel),讨论的大部分集中于科西后来的著作《马克思主义和哲学》。魏尔原想继续举办这类会议,但是当创建一个更持久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的计划出现时,他却改变了原来的想法,并且撤回了原来对这项研究计划的财务资助。<sup>[1]</sup>

“社会研究所”建立于特殊的时代背景,那时正值苏俄布尔什维克革命胜利,和中欧革命特别是德国革命失败之际。而且,它可以是对左翼知识分子感受到的重新评价马克思主义理论,尤其是重新评价在新的条件下理论与实践关系的需要的一个反应。就这一层意义而言,这个研究所形成了众所周知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这一更大规模的思想运动的一个部分,其特色一方面在于它以各种当时流行的哲学观点和黑格尔的学说,来重新解释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先进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关系;另一方面在于它对苏联的社会发展和国家政体采取了与日俱增的批判态度。<sup>[2]</sup>然而,在创建的早期阶段,这个研究并未构成一个独特的学派。诚如马丁杰(Martin Jay)所说:“……成为一个特定的学派的构想是在这个研究所被迫离开法兰克福之后才发展出来的(这个名称本身在这个研究所于1950年返回德国以前尚未用过)。”<sup>[1]P15</sup>

## 三

实际上,在这个研究所和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中,可以区分出四个主要的阶段。第一个阶段在1923年和1933年间。当时,研究所从事的研究具有相当的多样性,并不像往后批判理论专注于特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概念。事实上,由于它的首任主席葛林伯格(Carl Grünberg)是位经济和社会史家,而且他的见解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有密切的关系<sup>[3]</sup>,在他的领导下,研究所相当部分的工作具有强烈的经验色彩。葛林伯格在他的就职演讲(1924年)中宣称他自己心目中的马克思主义是一门社会科学。在这篇演讲中他还指出,“唯物史观既不是一个哲学体系,也不想成为一个哲学体系。……它的对象,不是抽象的,而是处在发展和变化过程中的现有的具体世界。”在葛林伯格的指导下,直到他患中风于1929年退休

为止,这一看法的确是研究所的许多研究者恪守的方向;譬如,魏特复格从事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研究(其中一部分在1931年曾以《中国的经济与社会》为题出版),格罗斯曼发展了他对资本主义经济趋势的分析,出版了《资本主义制度中累积与崩溃的法则》(1929),波洛克研究的则是苏联从市场经济到计划经济的演变,出版了《苏联经济计划的实验:1917年到1927年》(1929)。

第二阶段是指1933年到1950年流亡北美洲的时期,那时新黑格尔主义的批判理论的思想已被引进,成为“社会研究所”各项活动的指导原理。这一思想上和研究兴趣的转向,实际上在几年前就已开始了,特别是自1930年7月霍克海默受聘为研究所主席时,已经开始发生影响。诚如马丁杰在论及霍克海默的就职演讲“社会哲学的当前处境和社会研究所的任务”(1931)一文时指出,“……他与他前辈的研究之间,差异是显而易见的。”<sup>[1]</sup>哲学取代了史学与经济学,成为研究所的主要研究重点;而且,由于马尔库塞在1932年,阿多诺在1938年先后成为该所的成员,这一转变的趋势更是得到了加强与重视。同时,研究所对心理分析发生了强烈兴趣,这也成为它往后的研究和著作的一个突出的特点<sup>[4]</sup>。流亡期间,该所的主要成员在霍克海默的指导下,开始进行更系统的理论研究,并且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特色的思想流派。

到了1950年该所返回法兰克福之际,“批判理论”的主要思想,在许多主要著作中得到了清楚地阐述,而“法兰克福学派”也开始对德国的社会思想造成重大影响。日后,它的影响扩展到整个欧洲,特别是1956年以后“新左派”兴起,这是法兰克福学派在思想上和政治上影响最大的一个时期。它的影响在1960年代后期更由于激进的学生运动的迅速发展而达到巅峰。然而,这一重大影响并不是由霍克海默(他当时已到瑞典隐居)和阿多诺(他在流亡美国期间和在战后德国的新环境中已变得相当安分守己了)所造成的,而是由马尔库塞造成的,他也因此成为新的马克思主义批判思想的一个主要代表人物。

自1970年代初期开始,也就是自它的第四阶段开始,法兰克福学派的影响渐渐地消褪了,

而且,由于1969年和1973年阿多诺和霍克海默两人先后去世,它与曾经激发它兴起的马克思主义之间,已经形同陌路,套句马丁杰的话来说,“……后期的法兰克福学派已丧失了作为它(指马克思主义)的许多支流中的一员的权利。”<sup>[1]</sup><sup>[296]</sup>而且,它对社会理论的整个探讨方式也愈来愈受到新的或修正过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挑战。虽然如此,法兰克福学派的某些基本思想仍然出现在当今许多社会科学家(无论是马克思主义者或是非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中,而且,这些思想在哈贝马斯那儿获得了崭新的意义,不但对社会知识之所以可能的条件提出了新颖的批判,而且,对马克思的历史理论和现代资本主义进行了重新评价。

#### 注释:

[1] 有关该研究所成立的详细说明,请参考马丁杰(Martin Jay)所著《辩证的想像》(The Dialectical Imagination, Boston, Little, Brown & Co, 1973)一书第一章。

[2] “西方马克思主义”通常被视为一个出现在一九二〇年代的思想体系,它在一九六〇年代重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至于它的渊源则来自科西、卢卡奇和葛兰姆西(A. Gramsci)以及若干法兰克福研究所成员(特别是从一九五〇年以来的霍克海默、阿多诺与马尔库塞)的著作。有关这一方面的各种解释,请参见阿拉托(Andrew Arato)和布烈尼斯(Paul Breines)的《青年卢卡奇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的起源》(The Young Lukás and the Origins of Western Marxism,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9),以及安德森(Perny Anderson)著《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思考》(Considerations on Western Marxism,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6)。更广义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包括其他极为不同形式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流派便是明显的例子,它出现于世纪之交,直到一九三四年告一段落,而在近年又受到新的瞩目。请参阅博托莫尔与顾德所编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Austro-Marx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一书的导论。

[3] 关于葛林伯格的详细说明,请参看博托莫尔和顾德,前书,7-10页。

[4] 因此,弗洛姆(Erich Fromm)在一九三〇年初期曾是该研究所的亲密盟友,但由于他对佛洛伊德理论抱持与日俱增的批判观点,并试图赋予心理分析一个更具社会学意义的取向,终于导致意见相左,从而在一九三九年中断了他与该研究所的关系。

(编辑:赵文)